

夫妻同为经济学家的现象并不多见,然而刘世锦与江小涓就是令人羡慕的经济学家伉俪。刘世锦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江小涓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界人气最旺的女性专家,其在产业经济学和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魏杰、刘世锦、张维迎、邹东涛等,这些中国经济学界出现的勇于创新的中青年经济学家,都与何炼成先生有关,都是何炼成的学生。他们作为陕籍经济学家的代表,是我国改革中成长的最具活力的杰出群体。

夫妻同为经济学家的现象并不多见,然而刘世锦与江小涓就是令人羡慕的经济学家伉俪。刘世锦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江小涓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界人气最旺的女性专家,其在产业经济学和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他的论文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魏杰在中国理论经济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被誉为经济学界“京城四少”之一。出生并成长于陕南秦巴山区的邹东涛,多年来一直跟踪改革善举,善于敏锐捕捉,并以散文笔调阐述前沿思想理论问题,以“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的警句而闻名。他在何炼成教授掌门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坚守时间最长,进京最晚,但却是中央国家机关首例“考官”进京者,被誉为“进

京三杰”之一。

【杰出人物介绍】

江小涓,女,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原陕西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1984年12月至1986年11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任教。1986年11月至1989年10月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至1996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2004年8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党组成员。2009年1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结构调整中的产业升级与发展》、《工业经济学》、《中国工业企业组织结构变动长期趋势》等。获第五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张维迎,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诺贝尔奖得主 James Mirrlees 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 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致力于推动中国大学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商学院教育体制的改革。2006—2011

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主要著作:《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产权、政府与信誉》、《信息、信任与法律》、《大学的逻辑》、《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竞争力与企业成长》、《价格、市场与企业家》、《市场的逻辑》等。

张曙光,男,1939年9月8日生,陕西长安人。1963年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经济学教授。1966年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主要代表作有:《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等。

魏杰,1952年9月出生于西安,曾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

2015 中国经济学家地理(陕西篇) 陕籍经济学家:改革中成长的杰出群体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的中青年专家。自1979年开始研究经济学,先后着重研究宏观经济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企业财产制度问题、非国有企业问题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企业制度、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问题等。著作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市场经济研究》、《企业制度安排》、《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生命常青藤》、《企业前沿问题》、《市场经济前沿问题》、《如何启动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中国企业的盛世忠言》等。

刘世锦,1955年1月出生于西安市。1982年2月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年3月至1986年10月,在西北大学经济系(后为经济管理学院)工作,任讲师、教研室主任,并在攻读硕士学位。1989年11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12月—1994年3月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1994年4月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任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宏观调控部副部长、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主要著作:《后来居上:中国工业发展新时期展望》、《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为什么能够起飞》、《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济》、《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改革中的资产重组: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等。

邹东涛,1949年11月出生,陕西汉中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中组部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所有制改革攻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用事业体制改革》、《改革年中华的探索》、《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邹东涛西部开发文集》、《中国加入WTO宏观对策和行业选择》、《中国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股份经济》、《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无序与有序》、《十字路口上的中国:问题·探索·艰难的抉择》等。

◎附:陕籍经济学家名单(排名不分前后)

- 张曙光(1939—)
- 邹东涛(1949—)
- 李义平(1951—)
- 魏杰(1952—)
- 袁钢明(1953—)
- 宋国青(1954—)
- 刘世锦(1955—)
- 马晓河(1955—)
- 白小涓(1955—)
- 江小涓(1957—)
- 曹和平(1957—)
- 张维迎(1959—)
- 张军扩(1961—)
- 张宇(1964—)

2015 中国经济学家地理(四川篇) 川籍经济学家:博通经籍的学术大师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陈豹隐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贡献,是《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译者,被誉为经济学界的“南陈北马(马寅初)”。

谭崇台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被认为是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型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建构,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代光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著作等身,治学严谨,为西方经济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胡代光教授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倾注巨大心力,在北大经济学院师生中享有崇高威望。

胡寄窗教授是中国当代博学多才、中外兼通、古今兼擅的卓越经济学家,他在学术精神上强调立德、立言、立行,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学术理念和拓荒精神,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默默奉献,他的治学精神、学者风范,对我国经济学发展和教育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

罗元铮对经济领域有着广泛的研究,他不仅熟悉国内的经济情况,而且熟悉研究国际经济。他大胆介绍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经验,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学界提高国际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对策,给党和政府及时提出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受到了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很高的赞誉。他的品格和学识受到了教育界、学术界和工商界的尊重。

著名金融学家甘培根对我国金融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曾做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是“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创始人。

汤在新在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和经济学院院长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学生的培养和马克思手稿的研究,是中国较早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学者之一。他的里程碑的论文《从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确立了他在卡尔·马克思手稿研究的权威地位。

【杰出人物介绍】

谭崇台,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生于1920年,四川成都人。194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5年,哈佛求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里昂惕夫;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8年,谭崇台回国后到母校武汉大学任教。先后任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专门助理、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委员,校长办公室主任,教育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兼系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武汉大学学报》副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美经济学交流委员会中方委员,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研究会领导小组成员等职。主要著作:《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发展经济

学》、《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发展经济学概论》、《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胡寄窗(1903—1993)原名钟睿,四川天全县人。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东北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之江大学财经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院长,上海财经学院院长,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西大学教授。并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主要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大纲》、《当代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等。

胡代光(1919—2012),四川省新都人。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研究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47—1949年任湖南大学经济系讲师。1950—1952年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经济委员会科长。1953年调北京大学工作,先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等职。1988—1993年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委员。还曾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著作:《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当代西方经济学说》、《评当代西方

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当代国外学说论市场说》、《胡代光选集》、《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等。

宋承先(1921—1999),四川省青神县人。194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7年7月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学位。1951年—1987年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87年—1994年任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经济学院院长。1994年—1999年3月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主要著作:《现代西方经济学》、《马尔萨斯经济理论的批判》、《增长经济学》、《当代外国经济学说》、《当代西方经济思潮》、《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现代经济学词典》、《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等。

彭迪先(1908—1991),原名彭伟烈,经济学家。1908年生于四川眉山。1925年入北平宏达学院,1926年留学日本,1938年回国后,历任西北联大商学院政治经济系教授,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建国后,历任川西行署监察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兼文教委副主任、四川大学校长、四川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主要著作:《世界经济史纲》、《货币信用论大纲》。

陈佳贵(1944—2013),四川岳池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1969年参加工作,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

1964年至196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1978年至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1年后历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所长。1998年11月至2009年7月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代表性的作品为《陈佳贵经济文选》(《经济改革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等。

◎附:川籍经济学家名单(排名不分前后)

- 陈豹隐(1886—1960)
- 胡寄窗(1903—1993)
- 袁孟超(1905—1991)
- 彭迪先(1908—1991)
- 刘天怡(1914—1992)
- 胡代光(1919—1991)
- 宋承先(1921—1999)
- 王叔云(1923—2002)
- 罗元铮(1924—2003)
- 甘培根(1925—2006)
- 石柱成(1927—2006)
- 汤在新(1931—2007)
- 刘溶池(1942—2002)
- 陈佳贵(1944—2013)
- 谭崇台(1920—)
- 曾康霖(1938—)
- 杜厚文(1938—)
- 吴晓灵(1947—)
- 巫继学(1946—)
- 张其佐(1962—)

从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旧秩序和新秩序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上接6月21日04版)

推动股市上涨的重要力量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1922—1927年,华尔街上市公司利润增长幅度达到75%。当时有所谓旧经济和新兴产业之分。旧经济的主要产业是纺织、煤炭、公路,新经济的主要产业是汽车、石油、电力、无线电和消费电子。1913年,华尔街股票总市值大约为150亿美元,与伦敦市场大体相当,当时美国经济规模已经是英国的三倍。所以许多人相信,1920年代美国股市快速上涨,算是一种“补涨”。

1920—1910年期间,市盈率达到新的高度。1920年代华尔街股市,平均为15—20倍。1927年,市盈率下降到11倍,主要是许多上市公司利润快速增长。1929年最高峰时市盈率达到32倍。以此对照,1990年代互联网泡沫期间,美国股市市盈率最高达到45倍。以当时最赚钱的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为例。1927年,通用汽车公司盈利达到2.5亿美元,市值是20亿美元,市盈率达到9倍。当时美国的主要产业,如汽车和收音机等等,企业盈利皆大幅度上升。

纽约联储刻意维持低利率,应该是刺激华尔街股市投机的关键力量。早在1925年4月英国决定恢复金本位制之前,斯特朗就承诺维持纽约和伦敦市场的利率,刻意降低纽约利率水平,以鼓励国际资金流向伦敦,确保英镑稳定。一年后的1926年7月,斯特朗邀请另外三大中央银行行长(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法国中央银行行长莫诺、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沙赫特)到纽约密谈,商讨如何解决国际

金本位制所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会后,斯特朗再次决定降息0.5个百分点(尽管当时有四个联储分行强烈反对),从4%下降到3.5%。

纽约联储降息之后,华尔街股市迅速上涨,从当年的170点上升到年底的200点,股票经纪贷款从前一年的33亿美元增加到44亿美元。华尔街的股票经纪贷款一直是推动股市投机的关键资源。1920年之前的平均规模为10亿美元,1924年达到22亿美元,1925年增长到35亿美元,1926年激增到44亿美元。与此同时,股票按金交易比例提高到3—4倍,投机者购买股票,只需支付股票市值20—25%的资金。

1927年中期,纽约联储继续大幅减息,股市投机氛围日益热烈。到1928年初,美国各界要求联储应对股市投机的呼声日益高涨。随后三个月内,美联储将利率从3.5%急升到5%!然而,早已如脱缰野马的牛市狂潮根本就不会理会联储的加息措施,照样一路狂奔。股市之外,当时的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非常严重的泡沫。以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房地产泡沫最为著名。

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和大萧条的来临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是研究大萧条的权威学者。他有一段话相当精彩:“理解大萧条是经济学家一直梦寐以求的高远理想。大萧条不仅催生了宏观经济学,让它成为一门独立而独特的学问,而且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依然深深影响着经济学者的学术信念、政策建议和研究策略。此影响究竟有多么深远,

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撇开实际运用价值不谈,解释20世纪30年代颠覆全世界的大萧条,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巨大学术和知识挑战,令人激动不已。”伯南克将全面深入理解大萧条称之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确实,1929年华尔街的股市崩盘为什么会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数十年来,一直是经济学家热烈讨论和继续研究的重大课题。大萧条直接刺激催生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通论》针对大萧条而发;费雪“债务通缩理论”针对大萧条而发;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美国货币史》最精彩部分是关于大萧条;依成格林《黄金枷锁》针对大萧条而发;伯南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亦是针对大萧条而发。美国几乎每一位重要经济学家都必然会从思考大萧条的起源和内在机制里获得灵感。

大萧条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奇怪现象。1930年1年时间里,主要经济体系的工业产出皆大幅度下降。美国下降30%、德国下降25%、英国下降20%,全国失业人数急剧飙升——美国达到500万、英国200万、德国450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平均下降50%,包括咖啡、棉花、橡胶等等,无一例外。导致大宗商品主要生产国首先出现经济衰退,主要是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

1930—1932年的3年时间里,银行信用卡下降幅度达到20%。美国银行信用卡从500亿急剧下降到300亿。到罗斯福1933年3月4日就任总统之时,28各州的银行全部关闭,另外20各州的银行部分关闭。1/4的银行破产倒闭,房地产价格下降30%,一半以上

的房屋按揭违约。银行信用萎缩迫使矿产企业和工厂大面积关门。

钢铁行业开工率只有可怜的12%(占全部产能的12%)、汽车产量从年产20万辆下降到年产不到2000辆、工业产出下降一半,工业产出多平均价格下降超过30%;国民收入从1000多亿美元降到50亿美元,25%的劳动者失业,总失业人数达到1300万(当时全部劳动力是5200万),3400万人完全失去收入来源(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

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大萧条的传导机制

大萧条传导机制的第一个渠道。全球货币黄金储备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法国,两国占据全球货币黄金总量的60%。其他金本位制国家黄金储备急剧短缺,导致货币供应量剧减,通货收缩应运而生。这至少是全球大萧条的关键原因之一。即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导致经济失衡。

为什么全球货币黄金会集中到美国和法国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黄金大规模流向美国。1926年法国将货币法郎固定到25法郎=1美元。汇率大幅度低估,导致法国出口剧增、资本大规模流入、外出储备剧增(主要又是黄金和英镑)。英国1925年4月27日恢复金本位制时的英镑汇率(1英镑=4.86美元)大大高估,导致英国出口和整体经济衰退,尽管美国一再下调利率支持英国恢复金本位制。英国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却仍然继续下降

全球经济大萧条传导机的第二个渠道是股市崩盘的财富效应。1929年,美国股市下

跌40%,英国16%,德国14%,法国11%。各国企业利润出现惊人的萎缩。1929年美国公司盈利高达100亿美元,1932年亏损总额达到30亿。1932年7月8日,道琼斯指数跌倒只有可怜的41点。1929年最高位是381点,两年半时间跌幅接近90%。通用汽车1929年9月股价为72元,1932年7月只有7元。RCA最高股价是101元,最低跌到只有2元。

全球经济大萧条传导机制的第三个渠道是信用萎缩机制。全球信用突然急剧下降甚至枯竭。其一,1920年代后期华尔街大投机时代,全球许多资金流入华尔街市场。股市崩盘之后,欧洲各国指望资金回流本国(尤其是德国和英国)。事实上却没有,资金仍然继续向所谓安全天堂流入(主要是美国和法国)。其二,大萧条开始之后,各国开始约束资金流动,导致全球资金流动急剧下降。其三,当各国出现银行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之时,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于大规模信用变得异常谨慎,信用总量开始急剧下降。其四,信用需求是否亦相应急剧下降?因为随着最终需求下降,企业销售不畅,自然导致生产活动萎缩,信用需求大规模下降。

第四个渠道是费雪的“债务—通缩”机制。第五个渠道是辜朝明所阐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机制。第六个渠道是贸易保护主义机制,尤其是美国胡佛政府通过的《斯穆特—霍利法案》及其各国的相应报复措施。(选自作者新著《新资本论》第10章)

(完)